



陳寅恪的歷史學及語文學思想*

2024.4.25

主講人 |

孔令偉助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孔令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暨東亞研究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世中國與歐亞大陸交流史、科技史、全球史以及滿蒙藏諸語歷史語文學。著有〈蘇寧阿《萬里回疆圖》與十八世紀後期清朝的新疆地理知識〉、〈清宮藏傳佛教文物與乾隆帝的宗教心態〉、〈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等多篇期刊及專書論文。

* 本文原據 2024 年 4 月 25 日「清華通識人物系列演講」講稿，後續文稿編輯經研究助理鍾泓泰、簡瑞瑩、邱奕安、巫承興等人協助。關於筆者對陳寅恪的研究，可進一步參閱：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新史學》，31：1（臺北，2020），頁 53-102；孔令偉，〈史語所的語文學傳承及發展〉，收入李貞德主編，〈挑戰與新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九十五周年所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24），頁 313-336。

本次演講分為以下四主題：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陳寅恪治學的萌芽階段；陳寅恪如何將語文學方法引入中國乃至於華文學術界，特別是在其在清華國學院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教經歷和研究成果；¹最後則為陳寅恪學術興趣的轉捩點。目前學界與陳寅恪（1890-1969）相關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如余英時院士（1930-2021）、汪榮祖先生等。²而有別於余英時對陳寅恪內在理路的研究，本次演講則聚焦於外緣因素。

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

大抵而言，語文學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引入中國。在探討傳入背景前，需要區辨語文學（philology）和語言學（linguistics）的差異。Philology 最初並無統一的譯名，過往被翻譯為訓詁、文獻學等，為了與語言學 linguistics 區別，故今日學界通譯為語文學。Philology 關心歷史文獻的脈絡疏理，Linguistics 則專在探討語言文法本身。

語文學發軔於具多語種聖經校勘學術傳統的歐洲。至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校勘聖經的研究方法則開始引入其他人文學科。此外，歐洲海外探險和殖民，也同時拓展語文學的範圍。以梵文研究為例，如 William Jones（1746-1794）發現古梵文和希臘、拉丁文文法相似，進而建立印歐語系的假說。³

- 1 1925 年建立，始稱清華學校研究院。1928 年清華學校改制清華大學，因主設國學一科，故以清華國學院聞世。
- 2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三版）》（臺北：三民，2022）；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1984）。
- 3 Garland Cannon, Kevin Brine, *Objects of Enquiry: The Life, Contributions, and Influences of 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50.

十九至二十世紀，語文學方法引入日本後對東洋史研究產生深遠影響。日本東洋史研究者至法國和德國學習語文學方法，形成重視滿、蒙、藏、突等非漢文史料應用於中國周邊歷史研究的風潮。以白鳥庫吉（1865-1942）、內藤湖南（1866-1934）等為代表人物。⁴

中文學界首先對語文學關注的代表學者為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1877-1927），他們和法國東方語文學、日本東洋史學界都有密切接觸。羅振玉和王國維皆重視古代東方語文的多語種史料。在西夏文之外，羅振玉亦曾派其子羅福成（1885-1960）、羅福萇（1896-1921）、羅福頤（1905-1981）學習契丹、女真、蒙古與滿洲語文；如羅福頤便在羅振玉的敦促下，積極搜集關外碑銘並研究契丹文字。⁵而王國維在去世前，則著力於研究蒙古史的漢文史料。⁶王國維繼承乾嘉學者的目標，希望以新的語文學方法重修因成書倉促以致多為史家詬病的《元史》。

王國維在〈王國維致書馬衡〉（1922）中透露對語文學的關注：

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此在我國所不可不設者，

-
- 4 可參考白鳥庫吉，《塞外民族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0）；白鳥庫吉，《西域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1）等；內藤湖南拍攝，《滿文老檔》（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 [即所謂《加圈點字檔》]，1905年盛京崇謨閣原版照片，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圖書館藏）；內藤湖南著，玄幸子、高田時雄編，《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5）。
- 5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第723通，頁535；羅福頤輯，《滿洲金石志》（收入《歷代碑誌叢書》第23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1937年滿日文化協會刊本影印），頁1。
- 6 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臺北：正中書局，1975，據民國十五年清華學校研究所刊行叢書第一種影印）。

其次則東方古國文字學並關緊要。研究生有願研究者，能資遺法、德各國學之甚善，惟須擇史學有根柢者乃可耳。⁷

這段引文有幾點值得關注。首先，文中的「我國」是文化意義之中國，王國維認為滿、蒙、藏和中國文化之構成關係密切，而他憂心法、德等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已超越中國。其次，文中的「東方古國文字學」是指梵文、吐火羅文等語言，顯示王國維所關心的語文學不只有甲骨文、金文。最後，王國維建議派遣「史學有根柢」之留學生到法德等國學習，視歷史通識為學習語文學的先決條件。

陳寅恪在〈與妹書〉（1923）中也流露著與王國維相近的學術關懷：

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按：原文作「西夏」，依上下文意推斷，顯為「西藏」之誤。），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⁸

此時陳寅恪關心的學術領域有三。首先，唐蕃關係史。其次，為佛教比較文獻學，陳寅恪關切《金剛經》的版本和文獻問題。因

-
- 7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卷15，頁808。
- 8 陳寅恪，《書信集》（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2。

中古以降，中國佛學研究者多不通梵文，致望文生義而未能正確解讀內容。最後，陳寅恪關注「蒙古滿洲回文書」，其中回文即察合臺文。

陳寅恪治學之萌芽

上文〈與妹書〉的內容亦表達陳寅恪早期在海外治學的感想。陳寅恪起初深感於中國學界缺乏參考書籍與工具而不願回國，並強調利用各種語言史料研究歷史學與佛教文獻學，例如以梵文、蒙古文、滿文、察合臺文等非漢文獻開拓史源、考訂正訛的重要性。⁹

陳寅恪於哈佛、柏林大學就讀時，已學習梵文、巴利文、回鶻文、蒙古文，並為其他留學生所知。陳寅恪的留德同學李思純（1893-1960）曾作〈柏林留別陳寅恪〉（1923）：「佉盧結字珍聯璧，華梵繡經雪上頭。如我榛荊嘆荒落，多君鉛槧有清修。」¹⁰詩中所言的「佉盧」即佉盧文（Kharoṣṭhī），是當時西域出土書寫梵文的文字。另一位留德學者姚從吾（1894-1970）亦注意到陳寅恪對藏文的關注。¹¹

陳寅恪學習語文學方法，並進一步應用於中國史與佛經研究。如陳寅恪在〈陳寅恪致函傅孟真〉（1929）向傅斯年（1896-1950）道：

蓋現在佛經之研究為比較校刊學，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

9 陳寅恪，《書信集》，頁2。

10 李思純，〈柏林留別陳寅恪〉，《學衡》，22（南京，1923），頁88。

11 姚士鰲，〈史學系派遣留德學生姚士鰲致朱邊先生書〉，《北京大學日刊》，第1465號，1924年5月9日，第3版。

誤，更進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參以中央亞細亞出土之零篇斷簡，始成為完全方法。¹²

陳寅恪把 comparative philology 翻譯為比較校勘學，指以非漢文材料校刊佛經。

就如〈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所示：「許我忘年為氣類，北海今知有劉備」¹³，王國維和陳寅恪二人是忘年之交。兩人不只是品性相投，在學術研究上更同時關心《蒙古源流》（*Qad-un ündüsün-ü Erdeni-yin tobči*）等蒙古史料，以此補充正史之不足。王、陳二人對蒙古史料的重視，可視為乾嘉至晚清學術補正《元史》思潮的一種延伸。相較王國維只能運用漢文《蒙古源流》，陳寅恪進一步取得故宮圖書館收藏之滿、蒙文的《蒙古源流》，並希望通過語文學方法校勘滿、蒙、漢文版本。

陳寅恪早年深受德國語文學界的影響，並曾師從德國學者學習梵文、吐火羅文及其他中亞文字。如陳寅恪在〈《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1927）就提及：

昔年德意志人於龜茲之西，得貝葉梵文佛教經典甚多，柏林大學路得施教授 Prof. Heijrich Lüders 檢之，見其中有《大莊嚴論》殘本。寅恪嘗游普魯士，從教授治東方古文字學，故亦夙聞其事。¹⁴

12 陳寅恪，〈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24日，元4-6。陳寅恪，《書信集》，1929年某月24日，頁23。

13 陳寅恪，《詩集》（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17。

14 陳寅恪，〈《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清華學報》，4：2（北平，1927），頁1337。

文中「東方古文字學」的用詞亦見於王國維〈王國維致書馬衡〉中。兩者同樣重視「東方古文字學」此多語言史料比較的學術關懷，使兩人成為忘年之交。

陳寅恪的任教經歷與研究成果

1926 年陳寅恪回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開設東方語文學相關課程。1925 年於《清華週刊》刊登其在國學研究院計畫指導的學科範圍包括：

一為「年歷學（古代閏朔日月食之類）」；二為「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研究（如唐蕃會盟碑之藏文，闕特勤碑之突厥文部分與中文比較之類）」；三為「摩尼教經典回紇文譯本之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紇文及中央亞西亞諸文字譯本，與中文譯本比較研究）」；四為「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¹⁵

除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歷史學系任教外，陳寅恪曾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史學系開課，試圖積極培養東方語文學人才。例如，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本科三年級以上有志於從事內亞語文研究的學生提供指導，指導題目有四：「長慶唐蕃會盟碑藏文之研究」、「鳩摩羅什之研究」、「中國古代天文星歷諸問題之研究」、「搜集滿洲文學史材料」。¹⁶

15 清華學校研究院、清華週刊編輯部，〈學校新聞·研究院〉，《清華週刊》，24：2（北京，1925），頁 32-34。

16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北京大學日刊編輯處，〈研究所國學門通告〉，《北京大學日刊》，第 1998 號，1926 年 12 月 6 日，第 1-2 版。

以上相關題目，同時期歐洲與日本東方學界亦頗為關注，陳寅恪的授課主題實與當時國際學術接軌，希冀培養能夠「預流」的年輕學子。由此，亦可見陳寅恪早年的關注焦點，最初並非日後為大眾所熟悉之《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漢文文學著作。陳寅恪早期任執教於清華與北大，是延續他在歐洲留學時的治學關懷，強調比較多語種文獻的歐洲東方語文學傳統。以陳寅恪在清華所開設之「西人之東方學目錄學」為例，即源於陳寅恪早年對海外東方學研究動態的關注。此外，陳寅恪也利用語文學校勘多語種文獻的方法，對佛經進行研究，例如「梵文（金剛經研究）」即與〈與妹書〉（1923）所提及之：「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¹⁷ 息息相關。

但是當時囿於學生語言基礎不足、資源匱乏，學習語言的難度甚高，使歷史系學生缺乏學習語文學的條件，導致陳寅恪傳授東方語文學的成果有限。例如勞榘（1907-2003）就曾回憶道：「『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因為同學中沒有一個學過梵文的，最後只能得到一點求法翻經的常識，深一層了解沒有人達到。」¹⁸ 陳寅恪最終只能改變教學內容。就後來中國學界的發展而言，從事梵文研究者主要是外文基礎較好的學生，而非就讀歷史學系的學子，如林藜光（1902-1945）及季羨林（1911-2009）便是典型的例子。林藜光出身哲學系，季羨林原為德文系，二人並非專研史學，這恰與王國維、陳寅恪最初設想，希望派遣有歷史學根柢的學生留學相

17 陳寅恪，《書信集》，頁 2。

18 勞榘，〈憶陳寅恪先生〉（收入張杰、楊燕麗編，《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92。

異。以當時中國學界的條件而言，有歷史根柢但外文程度不足的學生，即使前往海外學習梵文等古代東方語文，極有可能囿於第二外語的水平而無法良好吸收。最終往往是大學時期攻讀法文、德文、日文等外語而能學有所成者，至歐洲和日本留學後方得較為順利進修其他東方語文。是以嚴格來說，當時中國學界並未實現王國維、陳寅恪送出具歷史學根基之留學生學習東方語文的理想。正如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1895-1965）在《歷史學系近三年概況》（1934）中表示：「國史高級課程中，以陳寅恪教授所擔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陳教授在本系所授課程多項極專門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學生程度不足，頗難引進。近年繼續更改。」¹⁹

在 1928 年，傅斯年創立中研院史語所，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發刊辭〈歷史語言所工作之旨趣〉中曾言：

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丁謙君的《諸史外國傳考證》，遠不如沙萬君之譯外國傳，玉連之解《大唐西域記》，高幾耶之注《馬哥博羅遊記》，米勒之發讀回紇文書，這都不是中國人現在已經辦到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藉重虜學呢！²⁰

19 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下冊，頁 744-745。原檔無署年度，然根據其中提及「新任助教吳春晗擬以明史自任」等相關線索，可以推測為 1934 年所書。編者將其定為 1929 年，誤也。

20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廣州，1928），頁 3-10。

傅斯年強調「虜學」與「漢學」並重，原因是當時歐洲各國學者善於用非漢文字重新解釋中國史，故能在研究材料範圍上超越傳統中國的漢學家。傅斯年在〈傅斯年致陳垣〉（1929）中曾言：

斯年留旅歐洲之時，觀異國之典型，慚中土之搖落，並漢地之歷史言語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是若可忍，孰不可忍？²¹

傅斯年本人雖長於古漢文，但就梵、藏、蒙、滿等其他東方語文學領域而言並非專家，故自史語所成立之初便積極延攬陳寅恪。

1928 年成為史語所研究員後，陳寅恪致力於以語言學方法進行歷史學研究。在史語所初期，陳寅恪持續進行《蒙古源流》的研究，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考釋序〉等內亞語文研究相關論文，是為其學術產量的高峰期。²²

以陳寅恪研究《蒙古源流》中早期吐蕃王統的記載為例。之所以使用清代的史料研究唐代吐蕃和唐朝之關係，是因當時藏文典籍稀缺，陳寅恪也沒有機會前往西藏搜集資料，只能利用手邊可取得的材料。《蒙古源流》轉引藏文文獻中關於唐朝跟吐蕃的記載，並譯成蒙古文。陳寅恪即根據《蒙古源流》所轉引的史料，重新考訂，並結合新舊唐書、及唐代遺留的碑文史料〈唐蕃會盟碑〉，寫成至

21 傅斯年，〈傅斯年致陳垣〉（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卷 2，頁 190-191。

22 陳寅恪，〈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北平，1931），頁 281-282；陳寅恪，〈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考釋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4（北平，1932），頁 404-405。

今仍聞名於世且頗具參考價值的〈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²³ 傅斯年更是對〈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讚不絕口，給予高度學術評價。²⁴

陳寅恪一方面在教學上有所挫折，另一方面又要兼顧史語所的工作，於是向當時的清華校長羅家倫（1897-1969）請假一年，在〈陳寅恪致羅家倫等〉中，陳寅恪自陳其治學心跡：

《蒙古源流》著錄於《四庫書目》，然訛誤極多，幾不可讀。王觀堂先生臨卒前猶勤校此書，然迄未能藏事。近日既得蒙古文原本，而中國文本系自滿文譯出，又於景陽宮發見滿文本，及蒙文書社新印漢文本，寶瑞臣、王靜安等校本，是治此書之一最好機會，故思以一年之期間為之。²⁵

在文中，陳寅恪繼承王國維的遺志，校勘《蒙古源流》漢、滿、蒙版本，因而請假一年。

當時對教授的規定較為寬鬆，陳寅恪在清華教授學生的同時，又在史語所擔任第一組的組長，對搜集研究資源作出貢獻。陳寅恪在史語所工作期間，除考訂《蒙古源流》與《藏文大藏經》，發表〈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考釋序〉等內亞語文研究相關論文之外。更利用其人際網絡，協助史語所從李盛鐸（1859-1937）手中購入內閣大庫檔案，並致力於內閣大庫檔案

23 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北平，1930），頁1-5。

24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收入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卷2，頁321。

25 羅久芳編，《五四飛鴻——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頁118-119。

的保存與整理工作。²⁶ 陳寅恪亦曾向傅斯年建議，利用學術、行政上的影響力，向中研院院長蔡元培（1868-1940）提案，由中研院購入中國境內新發現之西夏文、蒙古文、藏文、滿文等多語種史料，以避免流往海外。²⁷

陳寅恪也注重發掘具蒙、藏語言天賦者進入史語所工作。日後對中國藏學研究發展影響深遠乃至於被後人稱為「中國藏學之父」的于道泉（1901-1992），便是當時陳寅恪引薦進入史語所的人才之一。于道泉入職史語所前，曾隨語文學者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1877-1937）習梵、藏文，兼習滿文、蒙文；並在北海圖書館兼職，負責藏、蒙文圖書搜集與編目。²⁸ 陳寅恪乃在〈陳寅恪致函傅斯年〉（1929）極力推薦于道泉：

于君甚精藏語，又兼治蒙文，實不可多得之人才。現在北海圖書館，月僅三十元，甚不敷用；前年弟每月借錢與之，他時歷史語言北平分所中，似不可不用，此人斷不至為羊公不舞之鶴，請放心用。²⁹

于道泉後被聘為史語所助理員、助理研究員，並與陳寅恪合力編纂《西藏文籍目錄》，可惜《西藏文籍目錄》底稿後因戰亂脫失，至今下落不明。³⁰

26 〈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28年10月17日，元4-1。陳寅恪，《書信集》，1928年10月某日，頁19-20。按：根據此信原件，《書信集》整理者遺漏結尾日期「十七日下午七時」。

27 〈陳寅恪致函蔡元培、楊銓、傅斯年〉，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28年12月27日，元308-6。

28 王堯編，《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307-318。

29 〈陳寅恪致函傅斯年〉，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24日，元4-6。陳寅恪，《書信集》，1929年某月24日，頁23。

于道泉雖在進入史語所後獲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後改資源委員會）和史語所的補貼，遂得留學法國，期間曾在法國高等研究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與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學習，並報名東方語校（全稱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土耳其文課程。³¹ 然于道泉興趣廣泛，早在出國前便對神智學（theosophy）、世界語（Esperanto）等新奇知識懷有濃厚興趣，赴歐留學後漸漸不聽從傅斯年和陳寅恪的指導，與史語所的關係產生消極變化。³² 此外，于道泉與共產黨地下組織過從甚密，由於中共元勳陳雲（1905-1995）為其妹夫，于在留歐期間曾和共產黨人有密切的秘密書信來往。³³ 于道泉因政治理念的分歧，曾在 1944 年寫了一封措辭強烈的長信，與傅斯年正式在學術道路上訣別。³⁴ 故此後于道泉並未依約返回史語所服務，而是滯留歐洲，直到中共建政後才回到中國。于道泉在晚年自承年少時因和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學術規劃有所出入而導致誤會，因而最終與史語所分道揚鑣。³⁵

30 該目錄雖曾列入史語所單刊甲種之二，原題為《西藏文籍目錄》，最終本書似乎因故並無出版。歐陽哲生，《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臺北：秀威資訊，2014），頁 184。陳寅恪曾在 1930 年前後致書傅斯年討論本書的正式題名，見：〈陳寅恪致函傅斯年〉，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 16 日，元 357-19。

31 于道泉，〈于道泉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7 年 2 月 17 日，元 62-33。

32 于道泉，〈于道泉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44 年 1 月 24 日，李 14-24-4。

33 王堯編，《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頁 442-443。

34 于道泉，〈于道泉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44 年 1 月 24 日，李 14-24-4。

35 于道泉，〈序言〉（收入吳顯、吳碧云編，《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資料匯編）》，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頁 13-14。

學術興趣的轉捩點

過去研究將陳寅恪對歷史研究興趣的轉變，歸因於對中土的家國情懷、文化認同，故而自東方語文學的歐洲學術脈絡轉入隋唐史，即所謂「正統」中國史的研究。但在陳寅恪的書信中，卻不斷流露因世變造成的不得意。在 1938 年書信中即曾言及中日戰爭爆發後研究材料匱乏的痛苦：

聯大以書箱運費係其所付，不欲將書提出。現尚未開箱，故聯大無書可看……研究所無書，實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兩篇，竟無書可查，可稱「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大局如斯，悲憤之至。³⁶

更嚴重的是，有關東方語文學的批注書籍和相關文稿在轉運過程中遺失。陳寅恪在 1942 年的書信提及：

弟廿年所擬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遺失。中有蒙古源流注，係依據其蒙滿文諸本，并參稽其所出之西藏原書四庫提要所謂喇嘛經（按：藏文 rgyal rabs 的對音，意為王統世系）等者，考訂其得失。與沈乙庵書大異。後聞伯希和在庫倫獲元秘史元本，故欲俟其刊佈，再有所增刪。用力雖勤而原書價值頗不高，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復談論此事矣……又凡佛教經典之存於梵文者，與藏譯及中譯合校，凡譯匠之得失，元本之為何，列於校記。今雖失去，將來必有為之者……所餘者僅不經意之石印舊唐書及通典二種，置於別筐，故幸存。於書眉之上，略有批注。³⁷

36 陳寅恪，《書信集》，1938 年 6 月 17 日，頁 208。

適逢日本軍隊佔領華南，泰半的學者計畫將研究用書運輸到大後方的重慶。陳寅恪裝有《蒙古源流》、藏文《咖喇卜經》等相關書籍、研究、筆記之書箱在經過安南海防運到重慶的過程中，因所使用的書箱木頭較為珍貴，被盜竊者誤以為藏有金銀財寶，便把箱中的書籍換成磚頭。³⁸ 陳寅恪後來為尋回書籍，請託與軍界關係良好的俞大綱（1908-1977），希望尋找下落不明的書箱，最終仍未能尋回。³⁹ 故此後陳寅恪只好「不復談論此事矣」，並期望「今雖失去，將來必有為之者」。直至晚近學者對《蒙古源流》開展相關的研究，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烏蘭教授完成《蒙古源流》的校勘。⁴⁰

因此陳寅恪學術興趣轉變的箇中原因，係因相關研究書籍失竊，故不得不轉往研究其他方向。在書信中，陳寅恪道：「所餘者僅不經意之石印舊唐書及通典二種，置於別筐，故幸存。於書眉之上，略有批注。」⁴¹ 所以在藏書不見以前，陳寅恪並沒有專心致力於研究兩《唐書》和《通典》，僅是略有批註而已。陳寅恪因遺失書籍而展開對隋唐史的研究，最後變成隋唐史的大家，這既是歷史的偶然，亦是歷史的必然，因陳寅恪具有深厚乾嘉學術、文獻學的功底而有所成。

37 陳寅恪，《書信集》，1942年9月23日，頁244-245。

38 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頁265。

39 陳寅恪，《書信集》，1939年7月26日，頁60。

40 可參考烏蘭，《中國蒙古學文庫：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烏蘭，《文獻學與語文學視野下的蒙古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41 陳寅恪，《書信集》，1942年9月23日，頁244-245。

其中，陳寅恪隋唐史研究最廣為人知的還是「關隴集團說」。後來其弟子汪錢（1916-1966）以及中國大陸學者黃永年（1925-2007），都曾試圖對「關隴集團說」有所發覆。⁴² 但是「關隴集團說」在討論李唐作為非純粹的漢人政權，和北魏拓跋大量的文化交流乃至於通婚關係等議題，對今日歷史學人仍深有啟發。陳寅恪早已認識到「中國」本身是一組多元概念，這也正呼應當下葛兆光等人提出「何為中國」的歷史命題：中國並非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是從商周時代一個小小的城邦政體，到後來秦漢大一統，中國的實質開始改變，進而擴大，並漸有所謂非漢族羣的加入，使中國內涵產生多元化的情形。⁴³

結語

早年於清華、北大之教學效果受限於學生語文程度，而後于道泉又因親共立場和史語所決裂，以至於陳寅恪內亞史、語文學遺產皆無法進一步發揮影響，這些因素皆促使陳寅恪不得不轉向隋唐史研究。

陳寅恪在〈陳述遼史補注序〉（1942）中說：「頻歲衰病，於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久不敢有所論述。」，在〈朱延豐突厥通考序〉（1943）又說：「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年來自審所知，實限於禹域以內，故僅守老氏損之又損之義，捐棄

42 汪錢，〈唐高宗王武二後廢立之爭〉（收入汪錢著，《汪錢漢唐史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頁393-414。黃永年，〈對宇文周和關隴集團的再認識〉、〈從楊隋中樞政權看關隴集團的開始解體〉、〈關隴集團到唐初是否繼續存在〉（收入《黃永年文史論文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172-185、222-237、275-289。

43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於其間。」⁴⁴兩篇序文中，陳寅恪均感慨自己未能繼續研究塞外民族的歷史，並希望後繼有人。

不過，現在這個時代研究條件較好，數位人文的工具豐富，也有不少佛教文獻的資料庫，包括以漢文為主的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還有以藏文為主，後擴展到梵文、巴利文甚至漢文的美國佛教數位資源中心（BDRC）。另外當時陳寅恪認為難以取得之滿、蒙、藏的圖書跟研究工具，也已大量數位化而便於研究者利用。史料方面，當時難以取得藏文、其他西域古文字的文獻，現也已有各種資料庫收錄，甚至滿文、蒙古文、藏文的大藏經都已經出版。所以今日是一個材料爆炸的時代，不僅是東方語文學還有廣大的研究空間，陳寅恪所購得的內閣大庫檔案中所存之大量滿文、蒙古文、藏文、漢文的文獻亦有待研究發掘。

陳寅恪研究《蒙古源流》的出發點是用外族的歷史來補充國史的不足，也就是將歷史上的外族當作他者，來補充中國正史的不足。當代學界提出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東亞史及歐亞史（Eurasian history）等研究典範，則從世界文明的觀點出發，不將蒙古、西藏視為漢人的對立他者，該觀點雖與過去陳寅恪的出發點不同，但陳的研究基礎對今日學者無疑仍具參考價值。

最後，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1930）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

44 陳寅恪，〈陳述遼史補注序〉（收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集》），頁162。；陳寅恪，《書信集》，1943年1月6日，頁248。

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⁴⁵歷史研究和當代潮流息息相關。現在從東亞史、歐亞史、甚至海洋史、全球史、世界語文學（world philology）的視角來重新檢視陳寅恪先生學術遺產時，或許會有新的想法相應而生。

《柳如是別傳》對陳寅恪的意義

陳寅恪在 90 年代以後被賦予各種神話色彩，此與中共長年宣傳之馬列史學意識形態的崩解有關。陳寅恪在創作《柳如是別傳》時曾遭文革批鬥甚至雙眼失明，因而使《柳如是別傳》獨具意義。然實則很少人真的讀完、讀懂《柳如是別傳》，因為錢謙益跟柳如是浪漫故事涉及不少暗語及繁瑣考證，對此余英時的詮釋相對可信。⁴⁶另外，相較於陳寅恪，或許有人認為清華國學院的另一位導師趙元任（1892-1982）人生際遇可謂相對幸運。趙元任後來轉往美國學界發展，確實對他個人以及家庭而言是幸運的，但在學術上卻未必盡然。趙元任是一位極有所成的語言學者，學問深奧，可他赴美後卻在柏克萊大學擔任教授中文的語言講師，我們很難推知趙元任先生內心對此安排是否滿意。而談到陳寅恪，雖然他遭受各種磨難，可也正因如此，他留下《柳如是別傳》這般的傳世之作，所謂「草木不經霜雪，則生意不固；吾人不經憂患，則德慧不成」，或即此理。

45 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收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66。

46 可參考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三版）》。

關於陳寅恪何以未同史語所遷臺，學界長期有所討論。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陳寅恪在 1949 年後留在中國大陸，實際上應是意外造成的結果，並非在政治上認同中共建政。又根據相關檔案，陳寅恪雖無來臺，國府當局仍對他非常關注，實際上陳寅恪和臺灣的關係並無斷絕。如他的人事檔案雖因滯留大陸而被註記投共，但國民政府派駐香港的情治單位仍密切關心陳寅恪在廣州中山大學的情況，並根據其學術聲望以及文革受難之經歷，給予他同情的正面評價。要言之，根據史語所藏未曾公開之內部材料，陳寅恪與史語所的學緣及情感，並未因 1949 年兩岸分治而徹底割裂，箇中緣由，實難為外人道。

歐洲對東方語言研究的動機

十八世紀後期以降歐洲學界形成印歐語系的概念，其深層思想脈絡與基督教的巴別塔傳說息息相關。《創世記》記述人類原本皆共用一種語言，但人類建巴別塔通天，因而觸怒上帝降下神罰，只能使用不同語言以致無法合作挑戰上帝。在此概念下，歐洲發展出比較語言學和印歐語系學說，認為上古時期存在共通的印歐語族。加上當時東方主義的思想，即歐洲的文明，包括普魯士到後來的德國，對於東方有奇妙的想像。這被認為始於古希臘有關東方可開採黃金的傳說，曾有歐洲學者考證此處何在，最終推測位於西藏和印度北方一帶。日後甚至又產生東方神秘力量的傳說。例如納粹德國為何會借用 *Swastika*，就是對東方神秘主義的嚮往。所以德國或義大利的藏學研究，有一部分即拿納粹的經費，可見學術跟政治總

是有似有若無的聯繫。當然，或云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後人不須也不宜全盤否定當時藏學家的學術努力。德國的東方學研究即是在此複雜脈絡的東方想像下興起。十九至二十世紀初從事東方學的歐洲學者，或多或少各自懷抱程度不一的東方主義想像，這與帝國擴張的歷史背景有密切關聯。

陳寅恪與清華的聯繫、貢獻及成名原因

陳寅恪之所以躋身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其過人之處，在於他是當時對海外東方學界把握相對較深的中國史學者。當時在清華國學院任教的李濟（1896-1979）、趙元任都是在考古學或語言學方面卓然有成的學者，但相較於中國人文傳統中發達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等自近代歐美發展的社會科學，對當時清華國學院的學生而言有一定門檻，不易立刻普及。至於陳寅恪以語文學治中國史的學術取徑，從中原周邊重新檢視中國的歷史視野，解決傳統中國史學人所無法回應的課題，吸引了青年學子的關注；但另一方面學生們在缺乏語言基礎訓練的情況下，又無法真切理解他在語文學上下的功夫。所以最終陳寅恪成為一位既受學生愛戴，同時又望之儼然的存在。另一方面，陳寅恪出身仕宦之家，深具學術人脈。所以內閣大庫原藏於李盛鐸處，史語所卻能藉陳寅恪的優勢居中往來而購得內閣大庫。梁啟超（1873-1929）出身也非常好，亦是一位文化名人，可因為梁任公年紀較大，與學生之間的關聯就無法如此親近。當然，梁任公對於當時歐美或是東瀛日本的學術情勢也都有瞭解，可當時的學生認為最新的學問，就是陳寅恪剛留學帶回的東方

語文學。因此，一開始很多學生其實想跟隨陳寅恪學習東方語文學，不過一方面該學科的難度仍有門檻；另一方面，東方語文學需要大量的經費圖書、資源、師資進行配合，因為後來中國遭遇戰亂而難以為繼。要言之，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任教的時間雖不長，卻在華文知識界形成一個非常強大的文化符號，影響及於今日。

臺灣東方語文學的傳承

陳寅恪所說的新方法、新材料跟新潮流這三點，是我不斷反思的問題。讓所有人都像陳寅恪學十多門語言，有一定的困難。所以我近年來與資訊工程、數位人文等相關專業領域的學者，合作研發人工智慧技術降低語言的門檻，也就是使用 AI 去解讀滿、蒙、藏文文獻。在此我想引用黃仁勳有關 AI 降低技術門檻的一句話，即「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是工程師」，這並不是說立刻要讓人人都成為東方語文學家，而是希望通過 AI 技術降低學習語文的門檻，讓更多人可以貼近多語種史料，進而從更加豐富多元的視野來重新檢視歷史。同時藉由導入新興科技，使同學對傳統的東方語文學產生共鳴，進一步理解其學術意義。目前學界的共識認為 AI 不可能取代專業的歷史學者。所以我們不必去排斥舊學說，但同時也無須去對抗新思潮。因此，東方語文學跟 AI 的結合是我目前，也是未來要長期耕耘的一個目標。



主持人簡介

陳麗華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陳麗華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史、客家族群史、地域社會史、歷史人類學。著有專書《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 (1683-1973)》與多篇期刊及專書論文。



孔令偉助研究員演講影片連結